

延安时期如何涤荡中国污名化党

□ 敖带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构建形象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媒介的污蔑丑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让外界真正认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延安，争取话语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起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

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世界。

善用外媒通过“他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向国际传达。

1946年6月，斯特明经宋庆龄牵线，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接受斯特明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47年3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时，斯特明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明等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明随最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就这样，斯特明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抗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将蒋介石批准之《新华日报》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封团，禁止《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难，对《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更是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新华日报》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版文章都被“扣押”，如《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等。

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有260件被免登，有150次被删节，仅1月8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扣。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漏检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上午6点发送，10点即遭禁。国民党宪警四处搜查、没收，逮捕了100多名售卖《新华日报》的人员。但这一天的报纸发行数量却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各界读者均以一睹周恩来此沉痛之题词为快。

周恩来着眼长远处置重大灾害

□ 张 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每一场突如其来 的重大灾害，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都能以人民利益为重，在第一时间作出决断，调动国家资源，全力以赴做好救灾赈灾工作，力求把损失降到最低。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灾之后认真吸取教训，铭记前车之鉴，在挫折中反思，倾心谋定治本之策、长远之计，让同样的问题不再重演。

淮河泛滥后的兴修水利之举

1950年夏，淮河流域连降大暴雨，造成洪水四溢，淮河平原一片汪洋，几成泽国，村没物毁，大量民众无处藏身，攀树爬屋，惨象环生，损失严重。仅豫皖境内受灾面积就达4000余万亩，受灾群众达1300百万人。

严峻的水情，严重的灾情，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周恩来亲自指挥调度，举全国之力救济灾民，先后给灾区调拨粮食、盐、煤等生活必需品，发放籽种贷款，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支持恢复农业生产。

在全力以赴救灾的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要求，紧锣密鼓着手治淮水利工程的筹备工作。他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淮河严重灾害和目前治淮的情况汇报后，坚定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有用。”他还把淮河治理的消息告知从淮安来京的八婶母，说“家乡要挖一条大河啦，从洪泽湖一直到大海”，与家乡亲人一起分享喜悦。他所说的这条大河就是治淮工程的重头戏苏北灌溉总渠。

为了凝聚共识和力量，周恩来在1950年8月24日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作报告时，郑重指出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

入手”，首要的是“兴修水利”，而几条主要河流中淮河排在第一位。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 定》。11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态度十分明朗地表示，淮灾最急，是非治不可的，并且提出“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的治淮五项原则，进一步明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激励下，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淮河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水患逐步向水利转变，淮水安澜的美好愿望逐步成为现实。

细菌战后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1月下旬，丧心病狂的美国侵略者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连续在朝鲜、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等带菌昆虫30多种，引起许多以前没有发生过或很少见的传染性疾 病，并在污染区造成流行态势，给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危害。

获得情况反映和毛泽东有关“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的批示后，周恩来随即拟定行动计划，采取应对措施，化验病菌，“向全世界控告”“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进行防疫动员”，争取国际合作等。3月14日，他主持政务院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3月中旬，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先后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

示》和《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划定防疫区域等级，因地施策，督促加强领导，做好群众宣传，相关工作一直“坚持到秋后”。

在“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的同时，周恩来就“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摆上了议事日程，努力化疫情危机为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契机。1952年12月11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强调对于卫生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阐明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的贯彻；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要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2月31日，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决定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运动委员会。自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邢台地震后的防震抗震工作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此后余震不断，次生灾害严重，共有8000余人丧生，38000多人受伤，受灾面积达到32000平方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我国人口稠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的第一次大地震。

当日，周恩来获知邢台地震消息后，立即指示卫生部派医疗队前往救护，并连夜召集国务院和总参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驰援措施。第二天下午，他冒着余震危险，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赶赴灾

《新中华报》与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 林绪武 李婷婷

们信仰新医”。边区民众对医学的认识极其匮乏，生病的时候，“首先就要去求神鬼魂。或是找丹方草药来治，对于预防疾病更是谈不到，只有在求神不应，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来找新医，这样的结果就延误了防疫工作”。《新中华报》指出：“凡在边区之八路军所属各医院卫生所，及所有诊疗所等，皆应按规接诊民众疾病或住院。”医护方面，边区各医院酌情开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的卫生人员，分布于各个地区”，是边区卫生防疫的重点。医药方面，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议会提出：“建设医药房，以从事于防疫及治疗。”但是，“抗战时期，医药困难”，成为卫生防疫的障碍，因而，以中药补救边区西药的紧缺势在必行，中药“也许药力比较差一点，但伤病确是可以治好的”，表明卫生防疫要坚持中西医结合。

边区民众参与。“每个人都讲卫生，大家便都讲卫生了”，各种疫病才易于控制。故而，卫生防疫最重要的是边区民众的认可和参与。一是注重清洁，保持个人卫生。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开辟“防疫”专栏，专门推广民众防疫的注意事项八条。1940年3月12日，《新中华报》又公布个人卫生纪律八条，推进民众个人卫生的进步。二是捕灭蚊虫，消灭传染源。苍蝇、跳蚤、虱子、蚊子、老鼠都能传染病菌，民众要常晒被、勤洗澡等，积极开展灭蝇、灭虱运动。三是勤种疫苗，增强免疫力。“注射疫苗也是防疫的重要方法”，为便于阅读和传播，《新中华报》刊登漫画生动展示民众积极接种牛痘的场景，刊发口号喊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呼声，登载简

讯告知“大家前去种牛痘”，刊载“小常识”普及天花的预防办法——种牛痘。

红十字会、外来医疗团队援助。边区卫生工作的进步，“实有赖于令我们敬佩的外来友人以及各卫生团体的帮助：如红十字会，防疫队以及许多国际友人，如印度医疗队等，从物质上、技术上（医药、人才、防疫注射等）多方协助”。外国友人时常阅读《新中华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就经常找人翻译报纸的内容。鉴此，该报鼓励外来医疗团队援助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期待红十字会“创造更大的成绩”，希冀国联防疫团“协助卫生部扩大卫生运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边区卫生防疫取得明显效果，《新中华报》则以“防疫简讯”“医界简讯”等栏目进行报道和传播。

一是各机关积极响应，卫生防疫持续推进。1937—1938年，边区卫生防疫运动以延安市“卫生运动周”及“普及防疫知识”为中心。1939年，各机关单位印发卫生防疫标语、小册子等，八路军卫生部“制了很多标语，张贴在城内外街道和墙壁上，以引起大家的注意”。1940年，卫生防疫运动主要由各级防疫委员会领导。5月26日，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及千余民众参加的延安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共同商议“防疫运动之宣传”。在延安防疫委员会的推动下，延安市公共卫生卫生普遍改善，讲究个人卫生较前进步，“已大大减低了疾病的比率，在防疫运动中使群众对‘防疫卫生’的认识已经提高，奠定了今后防疫卫生工作开展的基础”。1941年，各级召开防疫动员大会，开展卫生防

疫运动。4月1日，扩大的防疫动员大会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号召机关学校对卫生注意，并宣布防疫计划”。

二是医院、医护形成合力，医药产量增加。1939年11月，中央医院成立，“对边区今后卫生工作的开展，有新的计划与决定”，1941年春，中央医院特设传染科，积极应对卫生防疫工作。而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逐步扩大规模，增设门诊，开辟床位。八路军总卫生部、八路军卫生学校、边区政府卫生处等纷纷开设训练班、医药卫生讲座，集中对医护人员进行卫生防疫教育。同时，医药困难得到解决。1940年9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卫生材料厂制造药品60余种，特效药30余种；1940年上半年，光华制药厂生产中药20万包；八路军军医制药厂除生产中药，又制作西药20余种。

三是民众的卫生观念增强，注重卫生行为。至1940年夏，延安市“许多市民能常常洗澡，生病也不求神”，到边区医院诊治的民众逐渐增多。同时，接种疫苗多了起来，1937年3月，延安市各机关、部队接种牛痘者1000人以上，另有400多民众接种。1940年6月，仅延安市“小孩种牛痘的有七八百人几乎全部都种了”，市民到防疫处打针的也有五百多人”，各机关人员接种率达到80%以上，有助于保障边区民众的健康。

